

假訊息管制與言論自由的平衡： 美國網路中介責任的邊界探察與反思*

盧建誌**

摘要

平台驅動市場中言論競爭失衡導致的壟斷危機，加劇煽動性內容的傳遞與政治極化的現象，促使民主機制遭受挑戰。本研究由憲法言論自由的視野出發，以直接因果連結、最小限制手段與規範不足為理論基礎，論證事前訂立專法管制假訊息勢將無法通過違憲審查的現實。由此，本研究循美國《通訊端正法》第 230 條的脈絡為觀察，試圖型塑以平台責任為核心的管制論述，構築兼具強化言論自由功能與彰顯「善良撒瑪利亞人」精神的假訊息規範模式。

關鍵詞：《通訊端正法》第 230 條、平台責任、言論自由、假訊息、善良撒瑪利亞人

* 本論文衷心感謝審查委員的悉心建議與反饋，以及編輯團隊的細心協助，更感激研究助理、學術同儕與業界專家於本篇論文完成過程中，各項行政協助與研究意見交流。本論文係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社群媒體時代下的假訊息管制與言論自由保障》（MOST 109-2410-H-004-188）之部分成果。

** 盧建誌，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助理教授，Email: jslu@nccu.edu.tw。
投稿日期：2022/12/02；通過日期：2023/05/18

壹、假訊息管制的沿革與發展

一、網路顛覆式創新的言論自由危機

有俗諺稱假訊息議題為「無煙硝的戰爭」，揭示出錯誤訊息的管制問題可能如同國防事務，對於國家安全和民主體制安定，造成社會劇烈的影響（Waldman, 2018）。在顛覆式創新的浪潮下，因數位科技的開發與應用，激發社群媒體的興盛，進而開啟媒體新紀元的同時，假訊息的生成與傳遞卻造成視聽受眾的認知混淆與社會歧視和極化問題。假訊息所涵括的娛樂與趣味性，使言論市場中真實的內容無法與編造不實的內容相互競爭（Guess & Lyons, 2020）。在網路的資訊洪流推波助瀾中，導致值得信任與知識含量高的報導，被社交機器人所發布的假訊息內容所淹沒而造成媒體困境，更造成世界各國的民主制度遭受威脅。當媒體受眾無法有效地在科技主導的資訊時代下，選擇真實無誤的內容作為依循，新科技的發展正避免民眾真偽莫辨、抑或是厭倦於辨別真偽時產生言論自由的危機（Napoli, 2019a）。

網際網路的興起，乃為數位平台地位急速提升的重要因素，由於資訊流通性的大幅提升，更使傳統單純紙本與聲音的訊息傳播方式，受到嚴峻的挑戰。現今因科技衝擊而生的數位平台更已取代傳統新聞媒介，成為最具影響力的資訊傳遞途徑，如網路搜尋網站所提供的新聞服務、以意見交流為功能的社群媒體與電子佈告欄，皆興起成為主流的資訊傳播平台（Flew, 2021）。數位平台因科技發展的趨勢，衍生為具有重要地位的訊息媒介，由於人民開始藉由此新的方式獲得新聞資訊，並由留言或各類形式發表評論與意見，進而由此歷程產生社會的共識與認知，造成數位的傳遞過程產生實質且即時的力道，影響世界各地所凝聚而成的公民社會發展與潮流。由此，政府對於數位平台上虛假內容的管制政策，對於人民的表達自由與資訊流通自由的維護帶來深遠的影響（Royal & Napoli, 2022）。

二、政府管制取徑的形塑

「假訊息」議題由於幾波科技創新不斷轉型，不論於亞洲、美國與歐盟國家皆盛行，且產生更深層的言論自由與民主人權問題（Fukuyama & Grotto, 2020; Napoli, 2019b）。立法權或司法權介入事前管制的手段，由於將產生政府對於言論自由進行直接內容管制並造

成民主機制侵害的風險，往往不被各國採用而落為最終考慮的手段（Citron, 2014; Citron & Wittes, 2017）。綜觀目前全球法規的發展趨勢，各國由於美國於資通訊產業鏈和市場的龐大經濟實力與影響，間接造就其所樹立的「網路中立性」（net neutrality）精神，廣泛深植各國的管制思維當中，促使國際上普遍認同支持以企業採取自我約束的內部監督規範為主，而避免由政府貿然介入言論市場的管制方式（Kosseff, 2019）。在此思維下，美國政府除對於平台管制逐步弱化與去管制化，1996年美國國會創設《通訊端正法》（Communication Decency Act, CDA）第230條（Section 230），給予平台業者一定程度於不法內容責任上的豁免，更使政府政策朝向數位市場上的網路技術發展不受實體世界規範的趨勢，甚至激勵各項顛覆式創新的網路科技迸發，進一步促進言論以嶄新的媒體形式流通（Goldman, 2019; Kosseff, 2010; Sylvain, 2018）。

當1990年代初期網路時代來臨，同時亦是資訊於網路虛擬空間傳遞量爆發的時刻，平台業者抑或僅係傳遞資訊的中介者，尚未有能力管控平台上大量的訊息內容，全然將訊息正確與否的責任加諸於業者身上似有所強人所難（Kosseff, 2017）。然而，此定義與內涵由於近年大數據與人工智慧科技的演進，導致臉書等平台業者近年對於資訊掌控的能力，逐漸凌駕傳統的認知和可能性。科技業者對於其社群媒體上資訊內容的管控，已能夠更全面的調配與並具有實質審查的功能（Schroeder, 2022; Kerr, 2019）。此不能同日而語的市場影響力和技術上優勢，促使政府開始檢討傳統的管制架構需調整或重新思考，而必須賦予社群媒體業者在管控有所疏失並發生損害時，應對於其管理上有所不周所產生的負面結果，擔當起一定程度的監督與賠償責任（Fukuyama, Richman & Goel, 2021; Wu, 2018a）。在假訊息的議題上，若由政府可採取的取徑而論，學理上共有幾種模式可為思考，分別為（1）內容管制（content regulation）、（2）中介管制（intermediary regulation）、（3）媒體教育與識讀（media education and literacy）（Calvert, McNeff, Vining & Zarate, 2018; Citron, 2014; Levi, 2018）。特別的是，美國身為全球網路經濟的領頭羊，在網路言論的問題著重於以媒介管制取徑出發的平台責任立法因應新興問題，不僅影響全球市場的發展甚鉅，更激勵各國紛紛跟進此立法潮流（Fukuyama & Grotto, 2020）。

傳統媒體的環境下，自由民主制的國家政府通常以頻譜稀缺性（*spectrum scarcity*）的本質限制出發，作為管制媒體市場的理論基礎，以調和政府管制行為與新聞自由所可能產生的緊張關係（*Bello & Jung, 2015; Wu, 2003; Yoo, 2012*）。直到 1980 與 1990 年代，因傳播技術在網路科技激發下快速發展，頻譜稀缺所誘生的資源限制與基礎設施構建成本問題，逐漸因網路與數位科技發展下資源限制受到突破的影響，而不再於傳播產業中顯得絕對且不可挑戰。傳播管制議題的趨勢亦導向新媒體有關的政策與法律問題為主流，開始強調科技平台影響力的驟升，凸顯政府於新媒體環境下於網路議題管制能力下滑的現實與轉變（*Citron & Wittes, 2017*）。此外，在美國《通訊端正法》第 230 條初立法時，學術界多認為運行於網路的數位平台，乃僅單純扮演意見傳遞時媒介的角色，而不需對於平台上的侵權或不法內容負責。然而，此論述卻因近代網路與數據技術的強勢演進而受到質疑，部分學者轉而認為，建構於數位通訊基礎上的平台，已不僅僅是具有媒介的特性，其內含的實質的影響與功能，足以使其能夠肩負更多元與全面的使命以強化訊息傳遞的效率。（*Citron, 2014; Goldsmith & Wu, 2006; Wu, 2018b*）然而，政府對於傳統媒體的管制思維，雖然被認為無法相對應於當今以網路和新科技為取向的媒體模式，因而無法全然以此為基礎，提出保障民主機制的解決途徑。然而，傳統媒體所引發重要科技創新延伸問題，如資源稀缺與新興媒體的內容管理究責等，仍為社群媒體平台發展中，現今政府所不應忽視且須重視和解決的基礎傳播規範問題。

綜上所述，網路平台和科技產業於數位、串流與人工智慧科技推波助瀾下，所增益的管控能力與影響力，已使學界開始重視平台是否應在其發揮日漸強大的功能同時，必須在管理不當致損害發生時，對於侵權的結果肩負起相對嚴格的監督與管理責任（*Flew, 2021; Napoli, 2019a*）。由此而論，相較於立法事前的管制，深究事後平台管制的法規範前例和司法判決，仍應為面對當今和未來社群媒體所造成的假訊息困境時，最具效用的思考模式且能解決問題的良方（*Fukuyama & Grotto, 2022*）。

三、競爭市場的失衡：言論自由保障的界線與位移

(一) 壟斷危機的再現

當今社群媒體儼然已成為全球社群最重要的傳播聯繫管道，其影響力不僅及於美國，更擴及於全世界媒體市場（Nielsen & Fletcher, 2020）。網路平台發展至今，卻彷彿走向類似於 1950 年代的廣播媒體掌控市場的景象，同樣逐步由少數企業擁有獨大的市場影響力（Goldsmith & Wu, 2006; Wu, 2012, 2018a）。

在 1990 年代初期，當網路平台因新傳播科技發展問世，預期將帶來媒體市場巨大衝擊時，網路業者允諾其將恪守傳統媒體脈絡下所發展出的多元與市場競爭精神，以致力於提供高效率與品質的產品和服務。然而，現今臉書、谷歌和推特等社群媒體平台盤據市場的情況，宛若美國無線電視（Over-The-Air Television, OTA）時代，廣播電視網對於視聽大眾的市場造成極大的影響。雖然，現今社群媒體無法明確被斷定為具有壟斷資訊提供的獨占能力，然而，其於市場上的勢力卻已彷彿如傳統的廣播電視網絡一般，擁有操控受眾接收資訊的地位與力量（Winseck, 2022; Yoo, 2012）。最顯而易見的案例在於，現今的網路社群媒體已掌握如傳統廣播電視網的「非常態影響力」，幾乎所有視聽受眾的資訊由其所決定，特別是網路社群媒體已具有決斷特定資訊內容擁有優先權，更可阻斷特定資訊的傳播，而進一步形成於使用者社群操作資訊壟斷的能力（Fukuyama et al., 2021）。

平台業者於言論市場上趨近獨佔（near-monopoly）或寡頭（near-oligopoly）壟斷的優勢地位，是否已使其如同早期的廣播電視網具有操控資訊傳遞與接收的能力，並使資訊受眾受到不實訊息的擺弄，進而作出錯誤的判斷與決策。由於，現存的社群媒體市場並未能發揮市場競爭的功能，造成下架平台內容的決定更加仰賴於背後市場勢力的操作，而使得資訊內容於平台的存活或流通，落入取決於更為主觀煽動性內容與政治極化的風險，最終造成網路環境中所應保障的言論自由精神受到嚴重的侵蝕（Winseck, 2022; Wu, 2011, 2018a）。

(二) 煽動性內容與政治極化的弊病

美國的社群媒體平台可依據憲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論自由，獲得管理不當內容時的言論自由保障。在美國的法規範脈絡下，平台對於內

容的監督權更因《通訊端正法》第 230 條的立法而獲得法律上的支持與保障，並由此法律基礎排除平台對於不當內容負擔侵權的法律責任（Keller, 2019）。然而，此類法律免責途徑的矛盾處在於，民主自由體制下的社群媒體，可能立於本國言論自由基礎所設立的網路免責法律，協助外國專制政權限制與其價值或觀點相悖的言論，進而造成原先良善的網路言論自由制度，甚至被誤用於協助專制政權打壓言論自由的窘境（Citron, 2014, 2018）。

早期的網路環境中，平台於內容自我約束的討論議題上，主要著重於如煽動恐怖活動、兒童色情與網路霸凌等，具高度威脅社會秩序可能的不當內容。然而，由於國際社會的緊密合作發展，自由民主體制與共產極權專制間的政治角力加劇，俄國與其他極權政府開始以社群媒體作為武器，並以政治的力量散佈陰謀論、極端主義與仇恨性言論等對於民主機制具高度危害性的網路言論（Goldman, 2019）。促使社群媒體步上如同傳統媒體的後塵，在政治勢力的操控下，藉由平台所具備的內容編輯功能，彷彿過去傳統紙本媒體和電視新聞媒體一般，對於網路使用者灌輸特定立場的意識形態，藉以激化社會的對立並影響自由民主機制的穩定（Citron, 2012）。此外，社群媒體的平台管控機制由於近年智慧運算科技的大幅進步，更促使其具有更強大的能力監控「政治性言論」，並協助特定的政治勢力形塑「歧視」與「極化」的觀點（Goldman, 2018）。

由於平台導致嚴重政治極化與煽動性內容的弊病，美國多項修法倡議與判決，藉由立法與司法的取徑促請重新審視言論自由市場保障的重要性。此波改革的倡議，除希望政府督促平台業者必須加強有害內容的管控，並使多元觀點的言論論述能不受政治極化的威脅流通於言論交流市場，以消弭言論多元失衡的「市場失靈」問題產生，而造成減損言論自由精神的問題（Wakabayashi & Kang, 2018, December 11）。

（三）市場功能與多元言論的捍衛

對於網路媒體市場，美國的管制取徑重點在於，使政府能夠適時以管制政策維持並提升「言論意見自由市場」（marketplace of ideas）的競爭功能，以促進網路平台的良性競爭關係，因而增進媒體市場的言論內容交流，亦使市場資訊流通的效率提升（Wu, 2011）。當今許

多經濟自由的國家，亦在此理論基礎下，試圖著重於以重振「市場競爭」功能的思維，防免大型具獨占力量的網路媒體平台，以其市場的優勢地位，影響媒體市場上言論內容的自由交流。以此思維取徑出發的學術理論認為，媒體市場應建構多元社群媒體平台相互競爭的環境，因而能提升網路空間中公民對話的交流機制，由此鼓勵不同的立場與觀點相互對話，降低與防止假訊息所造成的資訊誤導與受眾進而決策錯誤情形的產生，並避免得來不易的民主制度受到傷害（Crémer, de Montjoye & Schweitzer, 2019）。在假訊息議題上，民主自由國家正藉由不同的管制取徑，致力於支持市場的競爭與政治的多元化，以根據於不同政府體制下所能型塑的多元文化為目標，制定介入市場管制的時空條件與界限，目的在於尋求不同文化背景與政治環境下所能達成的民主精神（Goldman, 2018; Goldsmith & Wu, 2006; Wu 2018a）。

貳、假訊息立法管制與言論自由保障

一、違憲審查標準的界定與檢視

根據美國憲法判決所建構的雙軌理論，直接針對言論內容所為限制的國家管制行為，應經過嚴格審查標準的檢視。然而，至今美國法院判決仍對於言論內容的直接限制有所遲疑，更認為此種管制取徑對於假訊息議題言論自由功能的檢視影響甚鉅。在 2015 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 *Reed v. Town of Gilbert* 案中，判決指出此類審查乃適用於特定的言論，尤其是該特定言論是關於議題的討論或想法與訊息的表達，亦或該特定言論的內涵具有交流的特質。在本案的多數意見中，Clarence Thomas 大法官更指出所謂對言論內容的限制，乃要求法院考量政府試圖對於言論的流通進行干涉時，能夠清楚劃定限制的內行並進行區辨。舉例而言，假訊息的內容若具有議題討論或訊息表達的特質，若由於其具公共關聯性，將使其符合上述所稱可區辨而得之特定面貌。因而，本案意見認為對於假訊息進行管制，勢必須落入嚴格審查的檢視（“*Reed v. Town of Gilbert*”，2015）。

在 2011 年 *Brown v. Entertainment Merchants Association* 案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國家管制行為欲通過違憲審查嚴格審查標準，必須符合以下兩個要件；（1）具有「重大迫切政府利益」（compelling government interest）的要件，並且（2）管制的手段必須「嚴格限

縮」(narrowly tailored)，以達成該立法目的之必要最小限度為限。欲符合第一個要件，政府即必須具體地揭示出，確有的特定問題需要實施管制行為以解決，此外，欲加以管制的言論和其將造成的損害，必須存在直接的因果連結(“*Brown v. Entertainment Merchants Association*”, 2011)。對於假訊息的管制行為，支持的論點主要由兩種面向，對於其具有重大迫切政府利益進行探討，其一為防範假訊息，將避免選舉過程中，造成混淆而影響選民決策形成的理性過程，此外，管制假訊息亦將維護民主自治的機制，使選舉程序能貫徹民主的精神。第一個面向乃以微觀的角度，認為管制行為在於避免人民因假訊息之影響，而做出與未受假訊息影響前的不同抉擇，第二個面向以宏觀的角度，認為管制行為能夠避免民主社會的選舉結果，因假訊息的負面效應而所翻轉。總而言之，唯有嚴謹的檢視以上的要件和面向，才能夠在明確的證據下，認定管制假訊息的行為有所基礎。如同 Antonin Scalia 大法官在 2011 年於本案多數意見判決書所論述「模糊曖昧的證據並不足以有效地合理化政府於此議題的管制行為」，具體揭露嚴格限縮與最小限度對於政府假訊息管制議題上重要的意義(同上引)。

(一) 直接因果連結的辯證

於 2012 年 *United States v. Alvarez* 案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判決意見指出欲證明決策過程中假訊息的誤導，和所造成人民錯誤抉擇間具有直接因果關係並不容易，因為有太多的因素，可能影響一般受眾的心理狀態，進行構成其選擇和決策的結果(“*United States v. Alvarez*”, 2012)。若欲將各因素進行檢視，並進而分析其對於決策過程的影響，更是一個浩大且複雜的工程，因此，實際上非常難以釐清假訊息對於理性決策的影響，與其造成的效應究竟程度為何(Calvert et al., 2018)。

事實上，極其困難證明假訊息的傳遞與其所造成的傷害，更難以論證影響個人的決策行為和整體社會的決策結果，並產生負面的效應。由於假訊息和實質損害間的直接因果關係難以確立，因此在嚴格審查標準的屏障下，將難以認同以國家行為對於假訊息進行管制，具有重大迫切政府利益，並於公共利益上的關聯程度之高，足以允許國家以法律規範介入進行管制假訊息的產製與生成。關於此點，早在 20

世紀初著名政治哲學學者 Alexander Meiklejohn (1948) 即提出論述，認為維護一個平等的民主機制，需要讓人民能夠了解政府政策並在資訊充足的情況下做出理性的抉擇。我們可認在民主社會下的言論自由真諦，乃是促使人民完成「智慧的決策」(Calvert et al., 2018)。由於難以證明因果關係，在嚴格標準的違憲審查上，管制假訊息的立法面臨實際上無法提出足夠的證據證明「假訊息的傳遞將造成實質的損害造成人民選擇的偏差」，乃至無法如 *Brown v. Entertainment Merchants Association* 和 *United States v. Alvarez* 案所述，論證當今假訊息與重大迫切政府利益存在有直接的因果連結 (Phillips, 2019, December 2)。

基此，立法勢必難以通過違憲審查，並難以推動如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Anthony Kennedy 大法官在 2012 年於 *Alvarez* 案中提出的意見，認為假訊息的管制不只因未能證明直接因果的連結，同時無法通過嚴格審查的標準。各項證據顯示，政府立法管制假訊息之於民主制度的保障上甚或誤導人民決策的損害，並非實質存在因果關係。相較於其他媒體議題產生的效應，假訊息的影響僅僅是「微小且難以明辨」(small and indistinguishable) (*“United States v. Alvarez”*, 2012)。由此而論，國家對於假訊息立法管制的行為難謂有其正當性，甚至無法明確推論出特定對於假訊息問題進行立法管制的重大必要性與理由。

(二) 最小限制手段的考量

在 2014 年的 *McCullen v. Coakley* 案的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多數意見中指出，嚴格審查標準中所指的立法管制措施需為「嚴格限縮」，乃指立法者須以「最小限制的手段」，以達成維護重大迫切國家利益的目的。換而言之，對於內容進行管制的立法取徑，由於所涉及的重大迫切利益，尚能由其他較小侵害的方式所取代，因而無法通過違憲審查的檢驗。在此嚴格限縮的前提下，本案法院更闡明，政府在採取立法管制的行為前，必須證明無法尋求其他合理且更小侵害的取代方式。政府必須承擔舉證責任以證明，取代立法管制的其他措施，無法發揮功能以達成重大迫切利益的捍衛。因此，在此思考脈絡下，政府至少必須證明其他合理且更小侵害的言論管制行為，於假訊息議題上無法發生效用，並且無法使人民受到假訊息的混淆時，仍舊理性地

做出忠於自我決策的選擇（“*McCullen v. Coakley*”，2014）。

在以上案件意見的發展下，學說上認為可做取代立法管制的方式，分別有：（1）反制言論（counterspeech）（2）自律機制（self-regulation system）（3）平台責任（platform liability）（4）教育與媒體素養（media education and literacy）。綜上而論，在此憲法精神的「嚴格限縮」基礎下，不難瞭解為何美國普遍學者反對政府使用立法管制言論內容的方式，來禁止假訊息的生成與傳遞，理由為此取徑將有極大的違憲疑慮，侵害人民言論自由的基本權利甚劇（Citron, 2014; Kosseff, 2019; Wu, 2018b）。

（三）規範不足理論的適用

藉由審查法律是否符合嚴格審查標準中之緊密合切手段原則，可避免法規於無重要保護利益下過度限制言論，同時適用規範不足原則（underinclusivity）更可確保法規達到保護「政府重大利益」之目的（Bunker & Erickson, 2021），進而促使言論自由的核心價值獲得保障。舉例而言，於 2015 年的 *Williams-Yulee v. Florida Bar* 案中，法院已明確表示如果限制言論自由之法律，無法同時限制對政府欲保護的重要利益造成相同潛在威脅的言論活動，則其無法通過嚴格審查基準。換言之，規範不足的法規不但會造成促使一方言論壓制他方言論之效果，同時亦因其本身存在之法律漏洞及多項豁免規定，而無法達成保護重大利益之目的。換而言之，若法規經檢驗後無法符合規範不足原則，法院將因此認定該法規其公開宣稱的目的，僅具掩飾作用或實務上該項法規無法達成國家制定之目標（“*Williams-Yulee v. Florida Bar*”，2015）。

於適用規範不足原則時，美國喬治亞大學新聞與大眾媒體研究學者 William Lee（1993）教授認為應著重於審查法規所豁免的內容以作為法規是否制定正確之標準。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 2015 年 *Reed v. Town of Gilbert* 案及 2011 年 *Brown v. Entertainment Merchants Association* 案之判決內容可知，過度限縮言論之管制範圍恐致規範喪失其規範目的。*Reed v. Town of Gilbert* 案源起於 Gilbert 小鎮禁止居民使用戶外標誌以維護鎮容及交通安全，然該規範卻另外豁免其他特定標誌可於戶外架設。本案法院認為受豁免之其他類型標誌與臨時性方向標誌皆會破壞鎮景及危害交通安全，比起臨時性方向標誌，言詞尖

銳的意識形態標誌似乎更容易造成汽車駕駛之分心，故判定其規範違法限制表達自由（“*Brown v. Entertainment Merchants Association*”，2011）。另於 *Brown v. Entertainment Merchants Association* 案中，加州政府規定除非有父母或成人親戚代表，否則兒童不得購買暴力遊戲。法院判決認為該允許父母或成人親屬代替兒童購買，可能影響思想之危險內容物的豁免條款，可能危害此條解決社會嚴重問題的目的，故判定其不合法。簡言之，根據法院判決的基礎觀察到，如法規無法同時透過防止具有造成同樣危險的活動，以保護其重要利益時，該條規範即違反規範不足原則。參諸上述規範原則，更可反思而得若欲藉以立法達成禁止與公益有關之假訊息製造與傳播的目的，亦將無法滿足規範不足理論所捍衛的憲法言論自由內涵（同上引）。

二、立法事前管制的弊病與困局

綜上而論，假訊息的生成與傳遞，帶來言論自由保障機制相當程度的危害。特別是由於此問題將以其所造成的負面影響，滲染本質上正確且公正的資訊內容，若未能有效地防堵不當訊息的作用，可能導致正確的內容無法於言論市場中與其競爭，更造成媒體受眾盲從錯誤資訊。此困境除導致公平正義的核心價值受到挑戰，使得真實的資訊內容無法獲得彰顯。由以上分析可知，實際上政府架構下的措施對於假訊息的傳遞，並無法有全盤有效的管制效果。在不當內容的發布與傳播方式快速更迭的同時，政府並無法即時提出對策進行防免。若政府端為求管制上的效率而進行事前管制，不僅不符合憲法上的比例原則，更將嚴重侵蝕長久以來所建立的言論自由的基礎（Calvert et al., 2018）。政府建構不當內容的管制模式，將導致不切實際且僵化的管制態樣，不僅未能防堵不當言論的流竄，更可能對合法的言論造成嵌制，更將造成阻礙言論自由的流通的負面影響。

此外，如同注重言論自由保障的美國在憲法中第一增修條文的影響下，認為縱然訊息的內容不全然真實，政府應避免對於特定類型的言論與表達於立場有所偏頗，因而加以反對並抵制此內容於言論市場中的流通。特別是假訊息的生成與傳遞，目前尚未精確的證據證明，其對於言論市場有確切的危害，因而成立「直接因果關係」。此外，對於假訊息的因應，政府除立法直接進行內容管制外，替代的模式如媒介管制機制同樣能發生效果。政府的立法介入將因而未能通過嚴格

限縮原則的檢驗，並欠缺其於規範不足理論上的適用基礎，因此未能通過審查標準而有違憲的疑慮。因此，美國於言論自由保障的發展脈絡下，堅持政府應有義務採取不帶偏見的立場，捍衛各類型言論流於資訊市場的自由。美國政府對於內容進行直接的立法管制行為和介入，於學理上普遍不受肯定與支持（“*United States v. Alvarez*”，2012）。因此，政府的政策營造以更蓬勃多元的傳播產業市場出發促進意見的匯流，除將間接達成多元反制言論與假訊息的競爭，進而弱化假訊息的負面效應。更可激勵立法機關建構適切的「平台問責」機制，以促進平台科技創新的視野防免假訊息的危害，更跳脫立法事前管制取徑所帶來的邏輯困局，避免直接內容管制立法致使人民言論自由侵害的弊病。

參、邁向平台責任管制的辯證

一、美國《通訊端正法》第 230 條的誕生——強化言論自由的事後管制

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的目的是在於保障言論自由，第 230 條的實質作用在於建立基礎的標準據以促進言論自由的內涵得以彰顯。此展現出憲法第一修正案的建立並非劃定狹義言論自由的範圍，更非據以型塑保護界線侷限言論自由的發展（Skorup & Huddleston, 2020）。美國言論自由權威作家 Elizabeth Nolan Brown 認為第 230 條適時扮演網路世界的憲法第一修正案角色（Section 230 is the Internet’s First Amendment），讚許第 230 條於網路平台責任豁免上的重要貢獻（Brown, 2019, July 29）。此外，美國人權先鋒 David Williams 更認為社群媒體平台由於第 230 條的庇護所形成的言論交流，激勵網路社群無懼於實體世界責任歸咎的威脅，促使網路科技與虛擬環境的興盛，更造就創新科技潮流下，探究真理而進行言論辯論與對話的可能性（Kelly, 2019, July 10）。更遑論美國言論自由學者 Eric Goldman 教授則強力稱許第 230 條的強化言論自由功能，使其比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於網路世代發揮更完善的保障人權效益（Goldman, 2019）。

（一）立法的價值與脈絡

1996 年美國國會頒布《通訊端正法》第 230 條，揭示網路中介服

務者豁免其於第三方內容涉及侵權時的歸責條款。在此立法脈絡下，美國國會試圖藉由《通訊端正法》第 230 條具體形塑網路內容的侵權責任邊界，並劃定網路平台責任的問責的普世標準。以此立法闡釋與釐清網路內容與平台間的侵權責任與管理義務關係，進而促進網路言論自由流通的憲法核心精神（Franks, 2021; Penney, 2022; Volokh, 2021）。美國《通訊端正法》於 1996 年通過其中第 230 條第 c 項第 1 項揭示「在第三方提供資訊的情況下，互動式電腦服務的提供者與使用者不應被視為資訊出版或發言者，而擔負法律上責任」（No provider or user of an interactive computer service shall be treated as the publisher or speaker of any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another information content provider）的重要精神（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 1996, 47 U.S.C. § 230 (c)(1)）。然而，此第 230 條豁免責任的範圍，並不及於聯邦刑事犯罪、智慧財產權、州法與通訊隱私法的違法行為（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 1996, 47 U.S.C. § 230 (e)(1)(2)(3)(4)）。

1

具體而論，第 230 條立法的誕生乃基於回應 1995 年 *Stratton Oakmont v. Prodigy Services* 的司法判決中法院的意見。本判決認定對於使用者於線上平台所發布的誹謗性內容，由於網路服務提供者（online service provider）具有「編輯控制權」（editorial control），因此必須肩負身為平台的法律責任（“*Stratton Oakmont, Inc. v. Prodigy Services Co.*”, 1995）。本判決顯現普通法系基於長久發展下，論斷出版者（publisher）與傳遞者（distributor）是否肩負違法責任的原則與適用界線。在此脈絡之下，傳遞者如同傳統的書店與圖書館，對於其傳遞的內容非擁有限度範圍的編輯控制權。傳遞者非「認知」內容的不法並疏於進行移除，因此無法對其歸責並促其負擔法律責任。相反而言，出版者擁有更高程度的「主動性」對於平台內容進行「判斷」與「編輯控制」，其地位更同於報社或雜誌社。對於平台上的誹謗內容，出版者由於處於原始發動刊登的角色，實質功能與性質上和僅可能認知內容不法的傳遞者有所差異，因此在法律歸責上的認定更為直接且嚴格（“*Stratton Oakmont, Inc. v. Prodigy Services Co.*”, 1995）。

由第 230 條的立法說明揭示平台責任規範最初的立法動機，乃在於保護勤勉於防免惡意言論的「善良撒瑪利亞人」（Good Samaritan）於平台責任上獲得豁免，進而促進網路環境的健全發展

(Reidenberg, Debelak, Kovnot & Miao, 2012)。具體而論，第 230 條的立法在於增進網路、互動式電腦服務與互動式媒體的文化與技術生態持續開展與邁進 (Promote the continue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and other interactive computer services and other interactive media) (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 1996, 47 U.S.C. § 230 (b)(1))，此外，第 230 條的立法更肩負使網路與其他互動式電腦服務的商業模式，能不受聯邦與州法的管制，以發揮其維持動態且自由競爭市場功能的任務 (Preserve the vibrant and competitive free market that presently exists for the Internet and other interactive computer services, unfettered by Federal or State regulation) (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 1996, 47 U.S.C. § 230 (b)(2))。

1995 年美國法院 *Stratton Oakmont* 案判決的誕生，扮演平台責任法制檢討的重要開端。由本案的判決中，可知若使平台業者暴露於無豁免範圍的規範下，將使其無力應付使用者們頻繁且廣泛興訟究責的窘境，造成平台市場的崩壞與商業模式的市場失靈。此外，訟累所引發的技術與成本壓力，更無法化為激勵平台提升內部過濾機制的誘因，不僅無法誘發平台建構阻卻惡意言論的自律機制，更可能造成寒蟬效應導致言論自由的侵蝕。由此，證明第 230 條的立法對於網路科技時代的平台發展與創新具有關鍵的增益，更使「善良撒瑪利亞人」的中介管理精神藉由具體立法獲得彰顯 (Reidenberg et al., 2012)。

1. 言論競爭市場的強化

美國《通訊端正法》第 230 條在言論自由競爭市場功能的維持扮演重要角色，特別是第 230 條的立法促使市場新進的競爭者獲得於市場公平競爭的機會。第 230 條提供市場的誘因，鼓勵新進的競爭者投入辛勞並展現創新實力，以淘汰實力不彰的既存市場壟斷者，更進而實現市場競爭的重要功能 (Goldman, 2009, 2019)。具體而言，在第 230 條的立法保障下，新進市場競爭者不需耗費高成本的資金投入，據以建構內容審查的基礎設施。由於建構企業內部內容審查機制往往耗時費工，審查標準的不確定性，使法規遵循系統建立對於新興產業帶來一定程度不可預測的負擔，相對而言，對於已長期服膺或參與制定傳統標準的原有市場競爭者相對容易 (Skorup & Huddleston, 2020)。

對於新進市場競爭者而言，初步資金的募集與投入，往往造成其與既存競爭者的市場地位不平等，此外，其第三方使用者內容侵權責任可能造成的訴訟風險，亦可能同時構築新進競爭者投入市場的資源差距與資本高牆（Ardia, 2010; Tushnet, 2008）。因此，第 230 條的立法助益不僅將彌平既存市場壟斷者所盤據的優勢地位，更使新進市場競爭者免去面對既定內容審查標準的不確定與風險，進而降低既存市場競爭者與新進競爭者間資源的落差，最終鼓勵市場的競爭與消弭新興競爭者所需遭遇的市場參進障礙。平台責任的標準建立將能減輕既定內容審查標準所構築的市場障礙，除將彰顯市場競爭功能的發揮，更促使內容平台的科技多元發展與興盛，最終保障消費者權益與社會福祉。

2. 鞏固訴訟風險的可預測性

當平台業者因第三方使用者發布不當內容而引起法律上爭端時，尋求訴訟途徑的解決必須面對可能導致的潛在經濟上損失或成本負擔，第 230 條的立法使網路平台於平台責任上避免遭遇不必要的訴訟風險與不可預測性，並因責任界線的劃定穩固平台持續創新的動能與可能性。舉例而言，涉案當事人若欲發起訴訟，必須聘請律師擬定訴訟策略並負擔出庭的時間與交通成本（Leary, 2018）。不同於律師爭取訴訟勝利的立場，涉案當事人往往更著重於長遠商業經營的規劃，必須考量訴訟所帶來的整體經濟與名譽上的負擔，而非僅追求單純訴訟面向上的勝利（Sylvain, 2018）。具體而論，訴訟的制度在於鼓勵當事人拚搏不確定的案件結果達成公平正義的實現，然而，涉訟的當事人卻必須理性衡量，追求此結果所必須付出的代價並做出折衷的處置，目的在於降低法律上風險抑或停止更多的潛在損失（Aswad, 2020; Waldman, 2018）。此外，雖然訴訟程序依循陪審團與法院的決斷以正當的法律程序產生結果，但訴訟結果卻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可預測性，致使訴訟當事人必須肩負可能敗訴的風險和所致的名譽上負面影響（Arbel & Gilbert, 2022; Wyatt, 2022）。因而，由於尋求訴訟途徑解決問題所必須投入的大量經濟上成本，和敗訴風險可能招致的商業經營上不利益，被告往往最終攝於訴訟整體衍生的負面效應，選擇使用非訟的方式如簽訂和解契約，據以達成更具效益的爭端解決效果（Verstraete, Bambauer J. & Bambauer D., 2022）。

本研究觀察長久以來在不當內容的法律規範與所欲達成的價值內涵，可認將第 230 條的立法理解為具體法律規範，而憲法中言論自由條款則為價值內涵所形塑出的抽象標準。對於第 230 條立法的優劣，必須著重於審視第 230 條立法中所設定的法律規範範圍，是否能夠契合於憲法中言論自由所欲追求的價值內涵，方能對於第 230 條是否需修訂與如何修訂進行適切的思考（Citron & Wittes, 2017; Davis, 2022; Hoefges, 1998）。本研究認為第 230 條中平台責任立法的精神與彰顯，不僅確保平台業者遭遇第三方使用者有侵權或不法內容時，法條具體要件的建構減低法官個人心證所形成的訴訟結果不確定性。另一方面，第 230 條的存在，更能提供平台業者擬定商業策略具有基本的市場風險資訊，據以評估未來遭遇訴訟風險時，是否投入訴訟費用與各項訴訟成本，藉此提供平台業者更良好的資訊規劃各項商業模式的布局。

二、超越誹謗侵權的程序功能

1. 網路誹謗的規範基礎

第 230 條延續傳統實體世界「真正惡意原則」適用於誹謗罪的基礎，將中介平台基於共同侵權的責任延展至網路虛擬世界，並確立中介平台管理責任的邊界，使管理查證義務的立論延伸至網路平台責任監督義務的發展。在 1997 年美國聯邦第四巡迴上訴審法院於 *Zeran v. American Online* 案判決中，揭示第 230 條的範圍應同時涵括豁免平台作為訊息「發布者」（publisher）抑或「傳遞者」（distributor）的責任。本案判決否決原告爭執本案應適用於第 230 條以豁免「傳遞者」責任情形的論點。本案形塑不同於傳統論述的法院判決意見，確立美國聯邦第四巡迴上訴審法院支持訊息發布者與傳遞者應皆受第 230 條規範而不應豁免平台責任的司法論述（“*Zeran v. American Online, Inc.*”, 1997）。於 2003 年，美國聯邦第九巡迴上訴審法院在 *Batzel v. Smith* 案判決中，對於第 230 條的名詞定義與範圍進行釐清，本判決認為第 230 條中所稱之中互動式電腦服務，不應侷限於 *Zeran* 案判決與以往其他案件中所劃定僅涵括提供接取至網路服務的範圍。反而言之，第 230 條所稱之互動式電腦服務，應該包括如群研伺服器（listserv）服務等「任何資訊服務或其他系統」（any information

service or other systems) (“*Batzel v. Smith*”, 2003)。關於此論述，亦由後續 2004 年的 *Barrett v. Rosenthal* 案件中獲美國加州最高法院肯認，本案判決認為使用者即使非歸屬於任何網路服務提供渠道，仍可適用第 230 條並於符合法條要件下獲得免責的保護 (“*Barrett v. Rosenthal*”, 2004)。

除此之外，在 2008 年美國聯邦第五巡迴上訴審法院的 *Doe v. Myspace* 案中，判決指出第 230 條的豁免範圍應在網路環境「侵權」範疇下被更廣泛地認定，而非僅僅囿限於 *Stratton Oakmont* 案判決中所涵括的傳統「誹謗」類型方得免責 (“*Doe v. MySpace*”, 2008)。此對於第 230 條的免責範圍放寬的理解，後續亦在 2009 年第九巡迴上訴審法院以 *Barnes v. Yahoo!* 案判決中獲得支持。本判決更進一步認為第 230 條的適用範圍，應跳脫於以侵權行為作為「請求權基礎」基礎的框架，而應擴及於「出版者或發言者」的網路侵權樣態 (inherently requires the court to treat the defendant as the ‘publisher or speaker’ of content provided by another) (Giles, 2020, May 28)。

由以上案件判決的梳理，本研究觀察到美國歷年來的司法發展，法院對於第 230 條的適用範圍逐漸擴張，並跳脫於最初立法時所劃定的範疇。自從美國聯邦第四巡迴上訴審法院的 *Zeran* 案判決問世後，各美國聯邦上訴審法院即接續對於第 230 條的適用範圍進行擴張性的解釋，更在此演進中不斷對於網路平台責任範圍進行重新劃定，造成司法論斷的意見莫衷一是。在此司法解釋演進的影響下，第 230 條的擴張逐步賦予網路平台更大的科技發展空間。然而，在應對假訊息的問題上，當第 230 條中所涵括的網路平台責任，在司法解釋上已跳脫於傳統侷限於侵權行為的誹謗類型時，學說與實務皆有支持應藉由明確第 230 條的解釋範圍，重振由平台責任出發的假訊息解決途徑 (Hwang, 2020)。

2. 程序效率的鞏固與增益

關於平台責任相關的侵權行為樣態，可能連結於各式各樣不同的請求權基礎而致生訴訟。網路環境的假訊息，可能出自於網路使用者所發布的錯誤資訊，並導致妨礙名譽架構下「書面」或「口頭」誹謗的法律效果 (Reidenberg, et al., 2012)。誹謗型態的侵權行為更可能促使「陰謀論」的資訊傳遞，不僅形塑極化的政治環境造成社會族

群的對立，更可能造成社會秩序的混亂，形成國家安全不穩定的狀態（Citron & Wittes, 2017）。因此，第 230 條可防免網路平台成為致生誹謗性內容的溫床，並激勵平台肩負起適切責任，以阻止網路使用者惡意言論對於社會言論流通形成的毒害（“*Zeran v. American Online, Inc.*”, 1997）。

平台責任在假訊息議題上，必須特別審視的問題在於，第 230 條的重要功能是否在於以訴訟排除平台的責任，特別是著重於平台身為誹謗性內容出版者的情況。然而，若不實言論未能以平台責任的取徑防免，則在政治性假訊息形成公眾人物名譽的減損時，則僅能藉助書面誹謗或口頭誹謗並依循傳統第四權理論下的真正惡意規範（Hwang, 2020）。由此，可觀察到在未涉及平台責任的爭訟時，僅靠誹謗性侵權的規範除強度較弱且有所不足，更造成防免名譽侵害時法律工具的選擇捉襟見肘的情況產生，顯現法律救濟的途徑有所缺陷。具體而言，若無從由網路平台責任的視野進行爭訟，公眾人物的妨礙名譽案件即須藉由 *New York Times Co. v. Sullivan* 案所揭示的新聞媒體「真正惡意原則」進行攻防（“*New York Times Co. v. Sullivan*”, 1964）。然而，證明真正惡意往往成為舉證一方沉重的負擔，特別是依據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 *New York Times Co. v. Sullivan* 案中所指出，審判中必須「有充分的證據與事實據以論斷，報導的記者對於發布的新聞內容抱持極高程度的懷疑」（sufficient evidence to permit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defendant in fact entertained serious doubts as to the truth of his publication），方能具有足夠證據力排除真正惡意原則的適用（同上引）。

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藉由聯邦最高法院的判決內容，揭示中介者於第三方內容涉及誹謗疑慮時，必須符合嚴格的標準方能對於中介者進行究責。然而，遺憾的是目前根據第 230 條第 c 項第 1 款規定文義，無清楚闡明網路中介服務者若因明知或故意情事，導致第三方使用者內容的不法或侵權情況，是否得適用第 230 條整體表彰「善良撒瑪利亞人」精神的法理，以豁免平台法律責任。（Kosseff, 2022）。相較於明知或故意的條件，依循現今第 230 條的規範文義，中介服務業者豁免責任的重點在於是否有善意，在構成要件上雖試圖構建強化平台責任的標準，然而似乎仍不夠具體且缺乏嚴謹。

本研究深信完備第 230 條的立法具體將強化言論自由並達成憲法

第一修正案所未能觸及的重大程序上助益。藉此，在人民的言論自由遭受侵害而必須提起訴訟捍衛基本權利時，若能賦予第 230 條更適切的立法修訂，能夠提供法院更實質的受理審判基礎。基於《通訊端正法》中網路中介服務的規範，此訴訟上增益能具效率且果斷地釐清是否排除平台業者對於訴訟的侵權責任（Frye, 2017, November 12; Glynn, 2018; Goldman, 2019; Sharp-Wasserman, 2018）。此外，此積極規範的程序基礎，更能夠協助法院在此類言論自由的訴訟中，不為以往昏暗不明的抽象傳統民刑法的侵權責任所制肘，帶來訴訟程序中網路世代平台責任所適切需要的程序上效益。如前所述，第 230 條的立法意義不僅在於彰顯憲法言論自由的內涵使其與時俱進，在訴訟層面上，更能使法院判決的初期，更明確釐清網路平台業者是否需擔負第三方使用者內容的侵權責任。此不僅能夠助益法院於審判過程中，專注於限制言論內容的違憲審查判斷，更能降低傳統平台業者涉訟時，所帶來的高度訴訟成本，與削弱法院未有明確標準所附加於當事人的沉重舉證責任。

三、第 230 條的紊亂與未竟之志——重振平台的善良撒瑪利亞人精神

第 230 條立法以來引發導致假訊息橫生的質疑，特別是網路平台未能肩負不當內容的產製與傳遞，掀起檢討第 230 條平台怠於管理與明知故意的問責必要性，立法、司法與行政更盼藉此檢視，重建第 230 條本欲彰顯的網路平台「善良撒瑪利亞人」精神與內涵。2020 年因美國總統川普的網路言論煽動，導致美國國會殿堂造成暴力陳抗者死傷的悲劇後，雖《通訊端正法》第 230 條的立法威信受到社會大眾的質疑與批判。然而，學術社群紛紛因此社會失序事件的慘痛結果，開始反思網路平台業者立於其科技巨頭的龐大市場資源與影響力，並檢討規避平台內容所衍生違法與侵權責任的妥適性（Dickinson, 2021）。由此，第 230 條的最初立法推動者美國共和黨陣營前眾議院議員 Christopher Cox 認為，當今網路平台涉入誘導非法內容或連結非法活動的傳遞，因非法內容和活動未能具有促進公共對話的功能，平台主張的責任豁免本於言論自由的精神應不予寬待（Selyukh, 2018, March 21）。同為發起第 230 條立法的美國民主黨陣營參議院議員

Ron Wyden 亦認為，第 230 條應確保「善良撒馬利亞人」的平台守門人精神得以伸張，然而，第 230 條並未能由共同責任的積極視野，發揮拘束平台守門人怠惰的功能，更未能防堵犯罪分子在網路世界進行非法活動（Wyden, 2018, March 21）。此乃第 230 條在言論自由保障的核心價值上有所偏誤，必須重新檢討平台豁免責任於網路場域積極促進公共對話的實際效應。

無庸置疑地，由此美國掀起關於重新調校第 230 條的學術與產業層面討論，將帶來網路環境與政府管制思維的進化，更藉由案例的累積形成更適切社會和科技變遷的平台責任框架。本研究觀察到，自《通訊端正法》第 230 條問世以來，美國產官學界質疑其過於模糊的責任豁免邊界，導致假訊息問題的氾濫，不僅造成網路社群人心惶惶，更促使失真內容藉由網路和數位技術的渲染，引發言論競爭市場失靈的風險，甚至影響民主機制的運行（Franks, 2021）。由此，立法、行政與司法機構亦在此聲浪中，於學術、產業和政府政策等研討與交流會議中，除試圖傾聽各界對於第 230 條形塑的平台責任下所抱持的疑慮與建議，更苦思調整第 230 條的豁免責任反範圍所帶來的正面效益（Franks, 2022）。本研究堅信雖各界懷疑的聲浪帶來反思與檢討第 230 條的聲浪，但改革的方向必須本於言論自由精神的重新探勘，使革新以強化言論自由的功能與價值為依歸方為正途。

（一）網路平台共同責任的確立

社群媒體平台於假訊息治理中的「共同責任」（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將鼓勵與促進平台勇敢扮演端正網路惡意言論風氣的角色，更藉由平台共同責任的釐清與確認，提供第 230 條第 c 項第 1 款與第 2 款更具體的解釋，並強化其判斷平台責任的精確立論基礎。在網路活動的交流模式趨於交錯與繁複的時代，言論已由單純個別使用者的呈現與實施，在傳播科技的推進下演化為內容的構成，往往涉及不同的使用者參與和合力完成（Franks, 2019, October 11; Sylvain, 2021）。精確而言，產製與傳播惡性言論的直接與間接教唆與幫助等共謀行為，皆於刑事規責上有明確的法律規範與案例判決（Franks, 2022; Kosseff, 2022）。由此，本研究認為在當代平台與出版者分工達成言論內容呈現的數位網路環境，除映射出以共犯結構為基礎的惡性言論，勢必為言論自由保障必由傳統口頭與書面表達連結至

社群媒體創新科技發展時，所必須納入言論自由的考量。在言論自由保障的精神下，當代社會更應重視社群媒體平台涉入幫助、教唆使用者以共同完成惡性言論時，所必須建立的法律規範與責任界線。

由此，本研究認為媒體平台除需積極促進與協助使用者進行惡性言論的產製與傳遞，必需負擔共同責任而無法主張第 230 條豁免責任。此外，社群媒體平台若消極因懈怠未採取足夠防免措施，促使惡性言論的生成與蔓延，同樣必須共同責任而免除社群媒體平台的豁免責任可能性。本研究深信共同責任的解釋與貫徹，將建構更明確的第 230 條平台免責範圍，並構築與堅實第 230 條蘊涵的「善良守門人」精神與言論自由內涵。確保第 230 條「共同責任」的建立，更將激勵社群媒體平台確保其管理能力與合理決策的品質。

（二）第 230 條第 c 項的內部缺陷與衝突

然而，第 230 條第 c 項第 1 款過於寬廣的立法與判決解釋範圍，致使其論理邏輯無法與「善良撒瑪利亞人」的精神相互契合，更使其意涵與豁免共同侵權責任的法理與其他既定法律原則有所扞格（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 1996, 47 U.S.C. § 230 (c)(1)）。²具體而論，第 230 條第 c 項第 1 款所創設的平台責任豁免功能在於區辨言論「出版者」與「傳遞者」的差異，並以此提供平台享有免責為導向的權利上補貼（Citron & Franks, 2020）。此出版者與傳遞者區辨，未能扮演實質賦予平台責任的功能，致使第 c 項第 1 款成為平台逃脫管理責任使命的避風港條款。除導致平台責任定義寬鬆與界限曖昧不明的道德層面的風險，更致使鼓勵平台扮演「善良撒瑪利亞人」的雄心壯志，淪為黃粱一夢。

立法缺陷造成的責任寬待，不僅造成惡性言論的流竄與負面影響，更導致社群媒體平台的管理怠惰甚至於網路科技市場的壟斷。由於平台免責立法模糊所引發的權利補貼，致使社群媒體平台業者可選擇恣意節省監督惡性言論的管理成本（Citron & Franks, 2020; Sylvain, 2021; Goldman, 2019）。社群媒體平台除憑藉免責的保護傘，迅速累積與鞏固市場的優勢地位，更因操控惡性言論的產製與傳遞，導致致生言論內容多元失衡甚至政治極化的質疑，更招致平台濫用市場獨佔減損言論市場功能的疑慮（Bazelon, 2022; Sunstein, 2022）。因而，導致以平台免責為導向的權利豁免，實質上成為鼓勵惡性管理的破口，

除造成平台缺乏道德層面的動機與自發性提升管理品質，更使平台在經濟誘因不足的環境下，背棄提升自我的理想與扮演善良撒瑪利亞守門人的宏願。

相較於第 230 條第 c 項第 1 款的缺陷，檢視第 230 條 c 項第 2 款的文義，可明確得知立法者揭示鼓勵網路平台扮演「善良撒瑪利亞人」的核心內涵。在此解釋脈絡下，「善良撒瑪利亞人」的法律要件顯然為平台主張責任豁免的基礎，更凸顯立法原意中，設定網路平台肩負阻絕與過濾惡意言論的必要性。本研究認為第 230 條第 c 項第 2 款明確揭示社群媒體平台於互動式電腦服務的技術基礎下，若基於「善意」（good faith）自願限制具淫穢、猥褻、色情、骯髒、過度暴力、騷擾或其他令人心生厭惡性質的第三方內容，使其「接取」與「使用」的途徑獲致阻絕，則可豁免因上述不當內容所招致的共同責任（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 1996, 47 U.S.C. § 230 (c)(2)）。³相較於社群媒體平台因其私人企業性質，而立基於憲法第一修正案所當然擁有的第 230 條第 c 項第 1 款「編輯控制」上言論自由。第 230 條第 c 項第 2 款的立法，不僅促使社群媒體平台在內部經營的訴訟風險限縮於侵權範圍的確定成本，更使平台可藉由第 c 項第 2 款的實質法條，防免其不受難以預測的爭訟所侵擾。比起第 230 條第 c 項第 1 款僅延伸立於憲法第一修正案偏向抽象的言論自由保障意涵，第 230 條第 c 項第 2 款無疑提供更扎實的程序上保障，賦予社群媒體平台於此豁免範圍內多元化其商業模式並勇於投入科技平台的創新。

（三）邏輯相悖的體系解決途徑

「善良撒瑪利亞人」乃立於表彰社群媒體平台勇於守護網路正向風氣的美德，主動性地防免與抑制來自第三方使用者的有害言論。換而言之，被動的旁觀者抑或對於惡意言論攻擊的無動於衷，甚至可能因為違反注意義務，被歸類為誘導侵權與以此牟利的共謀。由此而論，善良的守門人精神絕鼓吹社群媒體平台隱於豁免責任的庇護，甚至鼓勵在免責的保護傘下，怯懦與躊躇不決於打擊有害內容的堅持與正義。

如上所述，第 230 條第 c 項第 2 款著重於闡明，社群媒體平台若未具備「注意義務」（duty of care），則無庸肩負怠於介入第三方有害內容的管理責任，因而平台藉此條款可豁免共同侵權責任，並彰顯

善意管理的精神（Citron & Franks, 2020; Sylvain, 2021）。然而，第 230 條的立法設計弔詭之處，即在於相對於第 230 條第 c 項第 2 款所蘊藏的「善良撒瑪利亞人」精神，第 230 條第 c 項第 1 款則全然未就社群媒體介入管理，以制止第三方有害內容的標準劃定有效範圍。換句話說，第 230 條第 c 項第 1 款立法意涵的模糊，導致平台對於有害內容不須採取任何程度的措施，即可輕易豁免潛在的共同侵權責任。更而甚之，在第 230 條第 c 項第 1 款的立法缺陷下，即使積極涉入誘導式侵權的社群媒體平台，亦可悠游於本款寬泛的免責範圍內，而無庸顧慮注意義務所帶來的共同違法責任。

由此可見，第 c 項第 1 款立法的設計不僅未能與第 c 項第 2 款相輔相成，甚至造成文義的衝突與對立。由於第 c 項第 1 款於立法設計意義上缺陷，促使法條意涵含糊與邏輯錯亂的疑慮，更導致第 230 條 c 項關於豁免責任的注意義務標準難以整體具體劃定，並導致凌亂且不具規範意義的整體立法體系與脈絡。藉由以上的論述與分析，本研究認為第 230 條第 c 項第 1 款應特別針對平台在共同侵權行為上的平台管理惡性進行釐清，具體須增補條文以明示社群媒體平台故意忽略有害言論的傳遞與流竄，將致使其喪失主張責任豁免的基礎，並須同時負擔共同侵權的責任方為妥適。

肆、美國《通訊端正法》第 230 條的啟發網路—— 言論自由的反思與重構

傳統實體世界的言論自由核心表徵，已受到當代科技創新的強力挑戰，不論是網際網路與數位技術所產生的科技革命，抑或接續由大數據和人工智慧所帶來的可能，皆使傳統定義下言論自由所涵括的特質，受到相當程度的動搖。自第 230 條立法至今，產官學界無不肯認社群媒體扮演虛擬世界主要言論媒介的潛能，更對於平台肩負網路交流中介的重責大任有相當高的期待。審視當今科技與社會所形成假訊息爭議，可察覺此假設的合理性，正激發傳統實體與當代虛擬場域規範整合的可能與必要（Citron 2009; Citron & Richards, 2018）。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台裔網路學者吳修銘（Tim Wu）教授曾因網際網路環境與文化急速發展，提出重新檢視傳統言論自由保障內涵的論述（Wu, 2018b）。其研究認為當社群媒體已儼然成為主要言論流通的

場域，傳統言論自由中有三個重要的內涵與特徵，必須進行再次的釐清與商榷：（1）首先，傳統上認為一般資訊受眾，能夠藉由媒體媒介獲得需要的知識解決問題與做出決策。然而，在科技的發展下，卻必須質疑資訊洪流帶來的知識量，可能使受眾於汪洋中滅頂，而無法由此尋獲有效的資訊，並加以吸收與應用；（2）此外，資訊稀缺的概念將在網路時代帶來不同的挑戰。網路的科技帶來言論市場上的資訊相互競爭地更加激烈。導致在個案上，網路時代下不如傳統的言論市場概念，若未能有群聚效應產生影響力，單獨或是小眾的民眾所表達之意見，將在競爭激烈且資訊爆炸的市場中，被多數的意見所淹沒，而完全無法於言論市場有提出意見進行競爭與協商的能力；（3）以往在傳統政治之架構下，政府擁有絕對優勢介入並影響言論市場的前提，亦在網路和數據盛行的時代，被一定程度翻轉，而相反地企業與民眾藉由科技的創新，將有更大的力道掌握更廣泛的資訊，以營造市場上的能力與公權力進行對抗（Wu, 2018b）。

此言論自由保障界線的轉變，已迫使當代社會必須有更先進的規範框架，才能夠跟上科技發展的腳步，更應重新檢視傳統言論自由保障的範圍以免民主社會價值的崩解（Wu, 2018b）。就此，本研究質疑將網路上各類型行為與活動是否能適切被視為憲法第一修正案下實質的「言論」，例如第 230 條平台責任豁免所涉及的「言論」與行為「表意性」的認定。具體而論，若將所有網路世界的活動與行為，皆涵括於言論自由保障的範疇，即抵觸憲法雙階理論中所揭示言論價值區辨的核心價值，導致無法凸顯高度價值的言論類型的重要性，除無法表彰言論自由激勵「追求真理」與「自我實現」的功能，更可能因言論自由規範界線的擴張，導致「言論溝通市場」成本增加與競爭功能失靈的風險（Chemerinsky E. & Chemerinsky A., 2022; Strauss, 2022）。

本研究觀察到若將所有新型態的網路活動與行為皆涵括於言論自由的保障，將實質上混淆與挑戰「公眾事務」在文化與社會脈絡下的特殊意義，進而對於網路環境的公共利益與公平正義的價值產生貶損。將僅連結於私人事務的網路活動與行為貿然置入言論自由的框架，亦將模糊言論自由的核心精神，更造成言論自由的價值過度擴張並受到濫用（Abraham & White, 2021）。本研究認為第 230 條的立法意涵映射出當代平台肩負網路虛擬場域中「言論媒介」的重要地位。

透過第 230 條第 c 項中揭示的「出版者」(publisher)與「發言者」(speaker)字眼，更顯現出「出版」與「言論」交流所具備的特殊意義。經過法條釋義與文意脈絡的推敲，可認為第 230 條試圖藉由「國際網路」與「其他互動式電腦服務」作為媒介，據以建構言論交流論壇以達到多元政治對話、文化發展與知識累積的言論自由價值，更對假訊息的因應帶來重要的啟發。

一、雙軌制的謬想——實體與虛擬的規範融合

本研究觀察到，第 230 條於立法之初所錯誤形塑的實體與網路世界規範差異，除變相鼓勵有害內容的侵權負面效果恣意轉移至虛擬環境而無庸負責。共同侵權的惡性延展至網路化外之境的亂象，更導致立場極化與尖銳內容於虛擬環境的蔓延，終至言論自由功能的失衡與崩塌。第 230 條立法過於寬泛的問題，已實際導致實體與網路世界差別待遇的歧視問題，亦同時違反公平與平等保護的法律原則。

端看第 230 條第 c 款第 1 項與第 2 項的「注意義務」標準，除可察覺實體與虛擬二分的理論邏輯與法理有所衝突，更未能構築完整清晰的注意義務邊界外，以網路世界為例外的立法脈絡與規範差異，未有適切的理論支撐，更造成平台的守門人功能無端因規範的不足受到弱化 (Citron & Penney, 2019; Volokh, 2018)。具體而論，適用於網路環境的第 230 條平台免責條款，與實體世界的共同責任法理相距甚遠，甚至侵權行為究責的法律基礎背道而馳。在實體世界中，注意義務的確立與鞏固乃為侵權歸責的核心基礎，本研究認為注意義務的法律原則，尚難遽以虛擬環境為理由，即驟然劃分實體與網路世界在共同侵權上有所適用上的區別。更遑論斷然認定網路世界不須適用注意義務的法理，乃為無所理論根據與邏輯推導上的欠缺與謬誤 (Citron & Norton, 2011; Penney, 2022, Volokh, 2021)。

本研究堅信網路和實體世界在規範上不應該全然雙軌，除將造成實體世界違法行為移轉至網路的化外之地，更造成網路惡性的蔓延和實體規範的困頓與崩解。就此，本研究提倡整合實體與虛擬的規範，而非壟統地聲稱有所差異與進行規範上的區別，方能弭補現今虛擬環境平台共同侵權責任的規範漏洞。

二、言論與單純行為的區辨

本研究認為，事實上當代諸多網路虛擬世界裡的活動並非「言論」抑或「表意性行為」(expressive conduct)，特別是其內涵並不屬於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言論自由範圍，而僅為言論自由保障外的單純行為(“Citizens United v.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2010; “Texas v. Johnson”, 1989; “Tinker v. Des Moines Indep. Cmty. School Dist”, 1969; “United States v. O’Brien”, 1968)。⁴由此，本研究主張言論自由並非保障所有與人類相關的行為，相較於口頭與書面的言論表達，若網路活動未能於核心意涵上，具有表達意見與想法的實質功能與目的，則無法僅以行為的行使和口頭、書面與出版形式的言論表達相關連，即貿然且片面推論網路活動應納入美國憲法第一修正的言論自由保障範疇。當法律在科技的演進下邁入管制虛擬空間的難題時，甚至網路使用者正利用單純且簡要的文字，達到更廣泛層面的各類型網路行為所欲完成的目的。本研究深信眾多網路行為本質上已因科技所促成的便利與效率，簡化至未能符合言論所具備的表達意涵，並造成言論自由保障的劃定範圍上的謬誤，進行言論與單純行為的劃分與區辨乃勢在必行且不可避免。

在涉及第 230 條平台責任的豁免時，現今美國立法與司法判決皆未能適切釐清網路活動涵括於言論自由保障的具體邊界，特別是在適用解釋第 230 條時，未先行檢視特定網路行為類型是否實際具備表達意涵，而習慣性默認各種網路行為自然落入言論自由保障的範圍。此第 230 條的立法模糊地帶與司法判決上的隱晦不明，不僅造成網路環境中眾多行為欠缺明確的基礎連結至言論自由保障的初衷，更形成現實實體與網路虛擬空間於言論自由保障上標準不一與明顯失衡的謬誤。此邏輯上的錯誤，乃非含糊以網路中立與科技創新的理由即能搪塞，除過度擴張網路環境中言論自由保障的範圍，更導致平台有恃無恐打著各類網路者行為均受言論自由保障的旗幟，恣意藉由第 230 條的庇護而豁免其平台管理責任。不但造成假訊息形成的言論市場競爭失能的處境更加嚴峻，亦減損網路平台肩負起「善良撒瑪利亞人」的誘因與意願。表意性內涵的缺失除誘發網路平台因藉口資訊爆炸推責更怠忽職守，最終使言論自由界線所映射的平台守門人精神蕩然無存。

三、觀點中立與公共論壇的辯證

本研究觀察到現今立法解釋與判決對於第 230 條的內涵和適用具有嚴重的誤解，除前述恣意、輕率且未經謹慎檢視，即將各類網路活動劃入言論自由的保障範疇，武斷地將社群媒體平台全然認定為「中立的公共論壇」（neutral public forum），甚至藉由第 230 條的解釋適用要求社群媒體平台，需具備「中立」的觀點方能主張責任豁免，更造成理論與邏輯上的錯誤論證與負面結果（Carlson & Wit, 2020; Di Meco & Brechenmacher, 2020; Penney, 2017, July 7）。具體而論，本觀點中立的謬誤聲稱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的核心涵括政府行為中立不歧視的價值。因此，循此謬述要求社群媒體僅有在未涉及「觀點歧視」（viewpoint discrimination）而進行管理行為時，必須謹守不歧視原則方得主張免責。更而甚之，本誤解斷定社群媒體平台若基於「觀點」移除、屏蔽使用者內容或剝奪其能見度排序，則相當於違背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中的不歧視精神，社群媒體平台因此喪失主張責任豁免的基礎（Padhi, 2018, April 20）。

然而，本研究深信第 230 條的本質應當在於促進言論自由的功能與實踐，而非削減言論自由的能量僅為迎合網路群眾的批判與質疑。若以傳統媒體與電信服務提供業者的分野為例，社群媒體平台顯然更偏向於傳統媒體的廣播電視經營，專業內容編輯與管理為型塑商業模式的必然展現，「公共論壇」的功能僅在特定內容如新聞報導的樣態浮現（Citron & Franks, 2020; Whitehouse, 2022）。在網路與數位媒體時代，相較於特定網路服務提供業者在專業技術上係單純扮演的中立媒介，社群媒體對於使用者內容進行適切地編輯控制與介入管理，儼然為其平台本質上無法迴避的專業職責與商業模式抉擇。具體而論，社群媒體平台的屬性不若網路儲存抑或寬頻服務提供業者單純，自然型塑社群媒體平台並非在文化與科技的功能上，全然適合要求其謹遵「觀點中立」與「公共論壇」的標準或義務（Greene, 2022; Citron & Franks, 2020）。

本研究認為將媒體平台的私人企業地位混淆歸類於國家行為的範疇，顯然導致言論自由核心價值的減損。特別是平台基於其私人經營的本質，明確非政府機構抑或為政府資金所挹注或管控帶有政府色彩的國營企業。恣意將私人平台與言論自由進行連結，邏輯上顯然造成

錯亂亦無堅實的論述基礎。此外，驟然將社群媒體全然型塑為「公共論壇」的論述，亦在理論上形成過於武斷和粗糙的推論與臆測，並造成解釋逾越言論自由保障目的的混亂。

四、堅實平台驅動的言論溝通場域

綜上而論，在美國市場自由競爭與資本主義的文化影響下，私人企業商業模式的開發與創新扮演政策制定的重要導引，在網路與數位媒體層面，不論立法、行政與司法機關皆受尖端科技媒體平台的政策倡議渲染，形塑、構建與充實內容規範的管制、監理甚或治理機制（Chemerinsky E., & Chemerinsky A., 2022; Persily, 2022）。本研究深信建構更加完備的中介問責機制，將以更明確的義務邊界激勵平台以創新驅動網路言論內涵的充實，並使現實體與虛擬並重的言論社會，成為更加多元與平等交流的溝通場域。在社群媒體科技當道的同時，不難察覺推特、臉書、Instagram 與 Youtube 以獨特與前瞻的平台科技研發與經營模式，形成創新文化與科技視野的共伴效應，甚至勝於政府政策研擬與推動所得觸及的力度與影響（Ceresney, Cunard, Dankworth & O’Neil, 2022）。因而，如同言論自由與網路政策學者吳修銘所論述，本研究觀察到在演算法與數據驅動導致的資訊氾濫年代，社群媒體平台對於言論自由的掌控甚至威脅，已在平台經濟壟斷市場與操控市場力量的催化下，迸發出更甚於傳統媒體時代政府所擁有的言論自由政策主導權（“*Force v. Facebook, Inc.*”, 2019; “*Gonzalez v. Google, LLC*”, 2021; “*Twitter Inc. v. Taamneh*”, 2022）。具體而論，傳統媒體市場所顧慮的政府干預言論自由與限制意見表達議題，已悄然在媒體創新科技的迸發下，使政府力量遠不敵社群媒體平台強勢的市場影響力，後者事實上已擁有比國家更加強勢的決策權。

因此，既然社群媒體平台商業模式選擇對於當代言論自由的介入力道，已全然不亞於政府政策所具有的傳統效果，言論自由的威脅更非如傳統媒體時代主要歸責於國家公權力。換而言之，當代言論自由的威脅已不再由政府所一方獨霸，私人平台的影響甚至勝過國家，成為言論自由功能維持與發展的最關鍵引擎。由此，私人平台所形塑的市場影響力與惡意怠惰和不當管理，除成為網路言論自由功能減損的主因。大型社群媒體平台掌握市場優勢地位而屏蔽多元觀點的表達，更輸出特定觀點導致社會極化，亦造就惡意操控市場力量的結果。在

假訊息議題上，本研究堅信唯有建構適切的平台注意義務標準，重新審視第 230 條的平台責任豁免邊界，屏棄虛擬實體二分與平台觀點中立的不實謬想。方能藉由明確且強化言論自由取向的平台責任邊界，使平台驅動的科技創新與規範的重整，最終營造更加良善且衡平的網路秩序與對話場域。

伍、結論

一、網路言論自由的核心與捍衛

言論自由核心價值的劃定與捍衛，不應因內容或行為置身於實體與網路虛擬世界有所歧異，更不應將網路環境理所當然視為「言論自由分化器」。一概將各類型網路活動劃歸為言論自由保障的範圍，已造成言論定義在理論與邏輯上的重大謬誤。更進一步言，本於言論自由保障公共對話的核心理念，即使形式上可認具有言論型態的內容或行為，亦必須謹慎檢視其是否具備表意性的實質價值，方能適切以言論自由的保護傘予以屏障。當社群媒體平台在主張第 230 條豁免責任時，必須確實證明非法的內容與行為，劃歸為上述標準的實質言論定義範圍中，才能真正使第 230 條的中介責任豁免條款，在發揮保障社群媒體平台在言論自由關鍵價值下，實現公共對話並激發言論自由發現真實與促進民主的重要功能得以綻放。

本研究深信訊息流通與平台責任議題的探索，必須確實由言論自由理論基礎出發，更應立於言論自由所蘊含的民主實現、追求真理和意見交流市場等多元功能為基礎的論述，方能提出適切的改革思維與解方。基於避免國家行政行為的概念過度擴張，甚至防免在網路時代驟然將國家的言論管制行為，恣意延展至私人經濟所建構的平台商業模式。本研究反對全然將觀點中立的價值標準，強加於媒體平台的私經濟場域經營中。除不應強求平台背負維持觀點中立的重責，亦應本於鼓勵多元言論流通與競爭的精神，避免網路媒體囿於維持中立的責任而陷入成本負擔的泥沼。此外，雖彰顯媒體平台的公共論壇功能具有重要社會價值，然而，非可忽視在特定情況下，平台經營亦可能僅具私經濟功能而承載單純商業言論的流通。因此，本研究建議在劃定平台責任邊界時，應由社群媒體的具體運營情狀以個案認定其屬性，避免驟然以觀點中立與公共論壇的論述，而框限平台多元經營的潛

能，方能激勵平台市場、文化與社會的持續創新與發展。

二、善良的決心——不應袖手旁觀的守門者

在假訊息藉由網路的溫床具體侵蝕言論自由精神之際，當今平台責任的規範思維與時空背景，儼然已無法與第 230 條最初立法時相提並論與契合。平台責任豁免機制的建立在數位創新的歷程中，促使國際網路環境下的科技產業，更勇於突破傳統的技術疆界實現科技的極限與未來。然而，在平台責任豁免的規範鬆綁運動中，第 230 條的建構無疑引發當今網路世界中惡意言論的流竄問題，具有負面效應假訊息大量孳生更對言論自由的核心功能造成威脅。第 230 條的平台免責機制，實際上可能正流為姑息網路平台，形成怠惰、魯莽與疏忽的藉口，而失去其最初立法時鼓勵科技平台構築管理效率，並以創新勇敢突破傳統實體世界規範時的初衷。

本研究肯定第 230 條所表彰的「善良撒瑪利亞人」精神之在假訊息氾濫的防制上意義重大，如同著名英國政治家哲學家 Edmund Burke 多次引述的俗諺：「邪惡盛行的唯一條件，是善良者的袖手旁觀」所言，社群媒體平台積極肩負起守門人的地位，抑制極端惡意的言論的晦暗，使社會趨向良善與包容，最終揭揭墮言論自由內蘊的正向能量與光輝。如同本研究在假訊息的傳遞與發展上所述，第 230 條作為網路時代平台責任的規範基礎，其存在的必要價值在於劃定平台注意義務的基準，藉以激勵平台勇於肩負起「善良撒瑪利亞人」的精神。相較於傳統媒體藉由誹謗性言論所根據的「真正惡意原則」，第 230 條無疑將此侵權責任為基礎的防線，延展至網路世界意見表達自由的維持，避免多元言論的價值受到社會極化的侵擾。本研究主張未來第 230 條的修法，應著重於第 230 條第 c 項劃定平台故意惡意或怠惰管理的注意義務，以明確本項第 1 款原先過於模糊且廣泛的立法設計，藉此使第 230 條介於管制過度與不足間的規範獲平衡。更使傳統媒體的共同責任基礎，循科技創新與社會演進的發展意涵彰顯於當代的虛擬社會中，平衡當代實體與虛擬世界間的規範差異，以使言論自由的功能於網路與現實的層次皆獲得鞏固與彰顯。

三、本土法制的借鏡與反思

近年來臺灣政府在產官學的倡議下，為求捍衛健全的民主機制與

言論自由環境，亦亟於投入假訊息與平台責任的立法與政策研究，並研議強化平台責任的規範以防阻假訊息所帶來的負面影響。行政院除自 2018 年開始研議假訊息專法立法的可能性，更於 2022 年提出《數位中介服務法草案》，盼以此消弭假訊息議題所造成的社會對立、爭端與質疑。於此本土法制改革的浪潮中，本研究堅信訂立假訊息專法的取徑勢將落入困局，如同本研究於假訊息立法管制與言論保障的論述中所強調，藉由建構不當內容的直接管制模式，最終將難以通過違憲審查中「直接因果連結」、「最小限制手段」與「規範不足」理論等核心憲法原則的檢視。同時，以訂立專法事前介入管制言論的表達，將滲染本質上正確且公正的內容進行流通，除將未能達成防堵不當訊息所造成的弊害，更將引發言論市場競爭市場功能的弱化，導致言論自由保障受到侵蝕的疑慮。

本研究深信平台問責機制的構築，將激勵本土言論自由保障的深化與鞏固，雖然通訊傳播委員會於 2022 年提出的《數位中介服務法》草案，在公聽會階段即招致不同面向的檢討甚或激烈的反對聲浪。然而，藉由建構數位平台中介服務提供者之責任，除將實際構築具體的平台守門人的義務，避免假訊息造成的言論競爭市場失衡、煽動性內容與政治極化的影響，更將強化本土言論自由與民主機制的核心價值。就此而論，美國《通訊端正法》第 230 條立法與判決發展中，所形塑的平台責任辯證與免責界線劃定，已提供臺灣政府再次形塑網路虛擬環境中平台「善良撒瑪利亞人」精神的具體範例與信心。本研究堅信在不久的將來，美國《通訊端正法》第 230 條的發展歷程與經驗，將持續提供本土平台問責機制強化的養分與啟發。此外，立足於強化言論競爭市場、鞏固訴訟風險可預測性與超越誹謗侵權的程序功能的基礎，將經由確立平台共同侵權責任，展開網路言論自由價值反思與重構。更將激勵未來臺灣本土法制的改革，邁向具虛實規範融合的前瞻並契合當代多元文化社會的良善價值。

四、棄惡揚善的平台管制邊界

網路環境實際上彷彿實體世界的投射面，在呈現人類社會的善良外，同樣映照出人性深層的陰暗與醜陋面。虛擬世界中群眾間的攻訐、謾罵與對立乃是現實社會人類天性的投射，此顯現出實體和虛擬的網路世界的關係並非全然歧異和斷裂，而應仍是相互對應與聯結。

在言論自由保障的脈絡下，本研究試圖由平台責任出發，強化法律的規範動能避免人類間惡性互動，進一步藉由第 230 條的修法建議，營造圍繞真誠的虛擬溝通空間與理想社會。本研究深信爬梳網路世界的價值觀，並重新檢視第 230 條的立法與修訂時，必須考量人類社會根深蒂固所存在現實的人性，基於棄惡揚善的價值剪裁出適切的平台管制界線，方能帶領虛擬世界重拾符合社會現實的法規範制度，並激發網路空間重塑以溝通為本的言論交流場域。

注釋

- 1 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 1996, 47 U.S.C. § 230 (e)(1)(2)(3)(4). “(e) Effect on other laws: (1) No effect on criminal law: Nothing in this section shall be construed to impair the enforcement of section 223 or 231 of this title, chapter 71 (relating to obscenity) or 110 (relating to sexual exploitation of children) of title 18, or any other Federal criminal statute; (2) No effect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Nothing in this section shall be construed to limit or expand any law pertaining to intellectual property; (3) State law: Nothing in this section shall be construed to prevent any State from enforcing any State law that is consistent with this section. No cause of action may be brought and no liability may be imposed under any State or local law that is inconsistent with this section; (4) No effect on communications privacy law: Nothing in this section shall be construed to limit the application of the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Privacy Act of 1986 or any of the amendments made by such Act, or any similar State law.”
- 2 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 1996, 47 U.S.C. § 230 (c)(1). “(c) Protection for “Good Samaritan” blocking and screening of offensive material: (1) Treatment of publisher or speaker: No provider or user of an interactive computer service shall be treated as the publisher or speaker of any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another information content provider.”
- 3 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 1996, 47 U.S.C. § 230 (c)(2). “(c) Protection for “Good Samaritan” blocking and screening of offensive material: (2) Civil liability: No provider or user of an interactive computer service shall be held liable on account of— (A) any action voluntarily taken in good faith to restrict access to or availability of

material that the provider or user considers to be obscene, lewd, lascivious, filthy, excessively violent, harassing, or otherwise objectionable, whether or not such material is constitutionally protected; or (B) any action taken to enable or make available to information content providers or others the technical means to restrict access to material described in paragraph (1).”

- 4 舉例而言，傳統上美國曾於最高法院判斷縱火焚毀國旗、燒毀送達的徵兵文件、以捐款方式支持政治活動與佩戴「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臂章的行為，明示因行為的樣態或本質具有言論所具備的「表意性」（expressive），方能歸屬於言論自由所涵蓋的保障範圍。

參考書目

- Abraham, K. S., & White, G. E. (2021). Conceptualizing tort law: The continuous (and continuing) struggle. *Maryland Law Review*, 80, 293-343.
- Arbel, Y., & Gilbert, M. (2022). *Truth bounties: A market solution to fake news* (Virginia public law and legal theory research paper No. 2022-61). Charlottesville, VA: University of Virginia, School of Law.
- Ardia, D. (2010). Free speech savior or shield for scoundrels: An empirical study of intermediary immunity under section 230 of the 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 *Loyola of Los Angeles Law Review*, 43(2), 373-506.
- Aswad, E. M. (2020). In a world of “fake news”, what’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to do? *Utah Law Review*, 4, 1009-1028.
- Barrett v. Rosenthal*, 114 Cal.App.4th 1379, 9 Cal. Rptr. 3d 142 (Cal. Ct. App. 2004).
- Batzel v. Smith*, 333 F.3d 1018 (9th Cir. 2003).
- Bazon, E. (2022). The disinformation dilemma. In L. C. Bollinger & G. R. Stone (Eds.), *Social media, freedom of speech, and the future of our democracy* (pp. 41-52).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ello, P., & Jung, J. (2015). *Net neutrality: Reflections on the current debate* (GCIG Paper No. 13). Waterloo, Canada: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 Brown v. Entertainment Merchants Association*, 564 U.S. (2011).
- Brown, E. N. (2019, July 29). Section 230 is the internet’s First Amendment. Now both republicans and democrats want to take it away. *Reason*. Retrieved from <https://reason.com/2019/07/29/section-230-is-the-internets-first-amendment-now-both-republicans-and-democrats-want-to-take-it-away/>
- Bunker, M. D., & Erickson, E. (2021). The jurisprudence of precision: Contrast space and narrow tailoring in First Amendment doctrine, *Communication Law and Policy*, 6(2), 259-285.
- Calvert, C., McNeff, S., Vining, A., & Zarate, S. (2018). Fake news and the first amendment: Reconciling a disconnect between theory and doctrine.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Law*, 86, 99-138.
- Carlson, C. R., & Wit, H. (2020). Online harassment of U.S. women

- journalists and its impact on press freedom. *First Monday*, 25(11).
<https://doi.org/10.5210/fm.v25i11.11071>
- Ceresney A. J., Cunard J. P., Dankworth C. M., & O’Neil D. A. (2022). Regulating harmful speech on social media: The current legal landscape and policy proposals. In L. C. Bollinger & G. R. Stone (Eds.), *Social media, freedom of speech, and the future of our democracy* (pp. xxiii-x1).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emerinsky, E., & Chemerinsky, A. (2022). The golden era of free speech. In L. C. Bollinger & G. R. Stone (Eds.), *Social media, freedom of speech, and the future of our democracy* (pp. 87-102).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itizens United v.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558 U.S. 310 (2010).
- Citron, D. K. (2009). Cyber civil rights. *Boston University Law Review*, 89(1), 61-125.
- Citron, D. K. (2012). Civil rights in the information age. In S. Levmore and M. Nussbaum (Eds.), *The offensive internet: Speech, privacy and reputation* (pp. 31-49).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itron, D. K. (2014). *Hate crimes in cyberspa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itron, D. K. (2018). Why combatting online abuse is good for free expression. In S. J. Brison and K. Gelber (Eds.), *Free speech in the digital age* (pp. 122-136).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itron, D. K., & Franks, M. A. (2020). The internet as a speech machine and other myths confounding Section 230 reform. *University of Chicago Legal Forum*, 2020(3), 45-75.
- Citron, D. K., & Norton, H. (2011). Intermediaries and hate speech: Fostering digital citizenship for our information age. *Boston University Law Review*, 91, 1435-1484.
- Citron, D. K., & Penney, J. (2019). When law frees us to speak. *Fordham Law Review*, 87(6), 2317-2335.
- Citron, D. K., & Richards, N. M. (2018). Four principles for digital expression (you won’t believe). *Washington University Law Review*, 95, 1353-1387.
- Citron, D. K., & Wittes, B. (2017). The internet will not break: Denying Bad Samaritans § 230 immunity. *Fordham Law Review*, 86(2), 401-423.
- European Commission, Directorate-General for Competition, Crémer, J., de Montjoye, Y.-A., & Schweitzer, H. (2019). *Competition policy for*

- the digital era*. Luxembourg, Luxembourg: 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Retrieved from <https://data.europa.eu/doi/10.2763/407537>
- Davis, A. P. (2022). The defamation of choice-of-law in cyberspace: Countering the view that the restatement (second) of conflict of laws is inadequate to navigate the borderless reaches of the intangible frontier, *Federal Communications Law Journal*, 54(2), 339-363.
- Di Meco, L., & Brechenmacher, S. (2020, November, 30). *Tackling online abuse and disinformation targeting women in politics*. Retrieved from Carnegie Endowment for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20/11/30/tackling-online-abuse-and-disinformation-targeting-women-in-politics-pub-83331>
- Dickinson, G. M. (2021). Rebooting internet immunity. *The George Washington Law Review*, 89(2), 347. Retrieved from <https://www.gwlr.org/rebooting-internet-immunity/>
- Doe v. MySpace, Inc.* 528 F.3d 413 (5th Cir. 2008).
- Flew, T. (2021). *Regulating platforms (digital media and society)*. Cambridge, MA: Polity.
- Force v. Facebook, Inc.*, 934 F.3d 53 (2nd Cir. 2019).
- Franks, M. A. (2019, October 11). Our 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 for mass shootings. *The New York Time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nytimes.com/2019/10/09/opinion/mass-shooting-responsibility.html>
- Franks, M. A. (2021, January 27). *Reforming Section 230 and platform liabilit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yber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New Administr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s://fsi-live.s3.us-west-1.amazonaws.com/s3fs-public/cpc-reforming_230_mf_v2.pdf
- Franks, M. A. (2022). The free speech industry. In L. C. Bollinger & G. R. Stone (Eds.), *Social media, freedom of speech, and the future of our democracy* (pp. 65-86).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rye, B. (2017, November 12). The possible redundancy of §230. *The Recorder*. Retrieved from <https://finance.yahoo.com/news/possible-redundancy-230-071557245.html>
- Fukuyama, F., & Grotto, A. (2020). Comparative media reg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In N. Persily & J. A. Tucker (Eds.), *Social media and democracy: The state of the field, prospects for reform* (pp. 199-219).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ukuyama, F., Richman, B., & Goel, A. (2021, January/February). How to save democracy from technology: ending big tech's information monopoly. *Foreign Affairs*, *100*(1), January/February 2021. Retrieved from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0-11-24/fukuyama-how-save-democracy-technology>
- Giles, C. (2020, May 28). Trump to take 'big action' against social media, *BBC New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bbc.com/news/technology-52832800>
- Glynn C. (2018). Section 230 as First Amendment rule, *Harvard Law Review*, *131*(7), 2027-2048.
- Goldman, E. (2009). The third wave of internet exceptionalism. *Technology & Marketing Law Blog*. Retrieved from https://blog.ericgoldman.org/archives/2009/03/the_third_wave.htm
- Goldman, E. (2018). An overview of the United States' Section 230 internet immunity. In G. Frosio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online intermediary liability* (pp. 154-171).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oldman, E. (2019). Why Section 230 is better than the First Amendment. *Notre Dame L. Rev. Reflections*, *95*, 33-46.
- Goldsmith, J., & Wu, T. (2006) *Who controls the internet? Illusions of a borderless world*.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onzalez v. Google, LLC*, No. 18-16700 (9th Cir. 2021).
- Greene, J. (2022). Free speech on public platforms. In L. C. Bollinger & G. R. Stone (Eds.), *Social media, freedom of speech, and the future of our democracy* (pp. 157-178).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uess, A. M., & Lyons, B. A. (2020). Misinformation, disinformation, and online propaganda. In N. Persily & J. A. Tucker (Eds.), *Social media and democracy: The state of the field, prospects for reform* (pp. 10-33).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oefges, R. M. (1998). Taking it back in cyberspace: State retraction statutes, defamation suits against online newspapers. *Newspaper Research Journal*, *19*(3), 95-109. <https://doi.org/10.1177/073953299801900307>
- Hwang, T. (2020). Dealing with disinformation: Evaluating the case for amendment of Section 230 of the 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 In N. Persily & J. A. Tucker (Eds.), *Social media and democracy: The*

- state of the field, prospects for reform* (pp. 252-285).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eller, D. (2019, January 29). *Who do you sue? State and platform hybrid power over online speech* (Hoover Working Group on National Security, Technology, and Law, Aegis Series Paper No. 1902). Retrieved from https://www.hoover.org/sites/default/files/research/docs/who-do-you-sue-state-and-platform-hybrid-power-over-online-speech_0.pdf
- Kelly, M. (2019, July 10). Conservative groups push congress not to meddle with internet law. *The Verge*. Retrieved from <https://www.theverge.com/2019/7/10/20688778/congress-section-230-conservative-internet-law-content-moderation>
- Kerr R. L. (2019). From Holmes to Zuckerberg: Keeping marketplace-of-ideas theory viable in the age of Algorithms, *Communication Law and Policy*, 24(4), 477-512.
- Kosseff, J. (2010). Defending Section 230: The value of intermediary immunity. *Journal of Technology Law & Policy*, 15(2), 123-158.
- Kosseff, J. (2017). Twenty years of intermediary immunity: The US experience. *SCRIPTed*, 14(1), 5-36. Retrieved from <https://scripted.org/article/twenty-years-of-intermediary-immunity-the-us-experience/>
- Kosseff, J. (2019). *The twenty-six words that created the internet*. New York,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Kosseff, J. (2022). A user's guide to Section 230, and a legislator's guide to amending it (or not). *Berkeley Technology Law Journal*, 37(2), 758-802.
- Leary, M. G. (2018). The indecency and injustice of section 230 of the 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 *Harvard Journal of Law and Public Policy*, 41, 553-622.
- Lee, W. E. (1993). The First Amendments doctrine of underbreadth. *Washington University Law Review*, 71, 637-690.
- Levi, L. (2018). Real 'fake news' and fake 'fake news'. *First Amendment Law Review*, 16, 232-327.
- McCullen v. Coakley*, 573 US 464 (2014).
- Meiklejohn, A. (1948). *Free speech and its relation to self-government* (1st ed.). New York: NY. Harper Brother Publisher.
- Napoli, P. M. (2019a). The structure of the algorithmic marketplace of ideas.

- In *Social media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Media regulation in the disinformation age* (pp. 107-131).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Napoli, P. M. (2019b). The taming of the web and the rise of algorithmic news. In *Social media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Media regulation in the disinformation age* (pp. 22-52).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New York Times Co. v. Sullivan*, 376 U.S. 254 (1964)
- Nielsen, R. K., & Fletcher, R. (2020). Democratic creative destruction? The effect of a changing media landscape on democracy. In N. Persily & J. A. Tucker (Eds.), *Social media and democracy: The state of the field, prospects for reform* (pp. 139-162).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adhi, C. (2018, April 20). Ted Cruz vs. Section 230: Misrepresenting the 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 *Lawfare*. Retrieved from <https://www.lawfareblog.com/ted-cruz-vs-section-230-misrepresenting-communications-decency-act>.
- Penney, J. W. (2017, July 7). Whose speech is chilled by surveillance? *Slate*. Retrieved from <https://slate.com/technology/2017/07/women-young-people-experience-the-chilling-effects-of-surveillance-at-higher-rates.html>
- Penney, J. W. (2022). Understanding chilling effects. *Minnesota Law Review*, 106, 1451-1532.
- Persily, N. (2022). Platform power, online speech, and the search for new constitutional categories. In L. C. Bollinger & G. R. Stone (Eds.), *Social media, freedom of speech, and the future of our democracy* (pp. 193-212).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hillips, W. (2019, December 2). The toxins we carry.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Retrieved from https://www.cjr.org/special_report/truth-pollution-disinformation.php
- Reed v. Town of Gilbert*, 576 U.S. 155 (2015).
- Reidenberg, J. R., Debelak, J., Kovnot, J., & Miao, T. (2012, April 25). Section 230 of the 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 A survey of the legal literature and reform proposals. *Fordham Law School-Center on Law and Information Policy, Fordham Law Legal Studies Research Paper*, (2046230), Retrieved from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046230; <https://www.fordham.edu/>

school-of-law/centers-and-institutes/fordham-clip/research/survey-of-section-230-of-the-communications-decency-act/

- Royal, A., & Napoli, P. M., (2022). Platforms and the press: Regulatory interventions to address an imbalance of power. In T. Flew & F. R. Martin (Eds.), *Digital platform regulation: Beyond transparency and openness* (pp. 43-67). London, UK: Palgrave Macmillan.
- Schroeder, J. (2022). Marketplace theory in the age of AI communicators. *First Amendment Law Review*, 17, 22-64.
- Selyukh, A. (2018, March 21). Section 230: A key legal shield for Facebook, Google is about to change. *NPR*. Retrieved from <https://www.npr.org/sections/alltechconsidered/2018/03/21/591622450/section-230-a-key-legal-shield-for-facebook-google-is-about-to-change>.
- Sharp-Wasserman, J. (2018). Section 230 (c)(1) of the 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 and the common law of defamation: A convergence thesi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aw Review*, 20(1), 195-241.
- Skorup, B., & Huddleston, J. (2020). The erosion of publisher liability in American Law, Section 230, and the future of online curation. *Oklahoma Law Review*, 72(3), 635-673.
- Stratton Oakmont, Inc. v. Prodigy Services Co.*, 1995 WL 323710 (N.Y. Sup. Ct. 1995).
- Strauss, D. A. (2022). Social media and First Amendment fault lines. In L. C. Bollinger & G. R. Stone (Eds.), *Social media, freedom of speech, and the future of our democracy*. (pp. 3-16).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unstein, C. R. (2022). A framework for regulating falsehoods. In L. C. Bollinger & G. R. Stone (Eds.), *Social media, freedom of speech, and the future of our democracy* (pp. 53-62).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ylvain, O. (2018). Intermediary design duties. *Connecticut Law Review*, 50(1), 203-277.
- Sylvain, O. (2021). Platform realism, informational inequality, and Section 230 reform. *The Yale Law Journal Forum*, 131, 475-512.
- Texas v. Johnson*, 491 U.S. 397 (1989).
- Tinker v. Des Moines Indep. Cmty. School Dist.*, 393 U.S. 503 (1969).
- Tushnet, R. (2008). Power without responsibility: Intermediaries and the First Amendment. *Georgetown Washington Law Review*, 76, 986-

1016.

- Twitter Inc. v. Taamneh* (Docket 21–1496) (2022).
- United States v. Alvarez*, 567 U.S. (2012).
- United States v. O’Brien*, 391 U.S.467 (1968).
- Verstraete, M., Bambauer, J. R., & Bambauer, D. E. (2022). Identifying and countering fake news. *Hastings Law Journal*, 73, 821-860.
- Volokh, E. (2018). The law of compelled speech. *Texas Law Review*, 97(2), 355-396.
- Volokh, E. (2021). Treating social media platforms like common Carriers? *Journal of Free Speech Law*, 1, 377-462.
- Wakabayashi, D. & Kang, C. (2018, December 11). Google’s Pichai faces privacy and bias questions in congress. *The New York Time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nytimes.com/2018/12/11/technology/google-pichai-house-committee-hearing.html>
- Waldman, A. E. (2018). The marketplace of fake news. *Journal of Constitutional Law*, 20(4), 845-870.
- Whitehouse, S. (2022). Section 230 reforms. In L. C. Bollinger & G. R. Stone (Eds.), *Social media, freedom of speech, and the future of our democracy* (pp. 103-118).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illiams-Yulee v. Florida Bar*, 575 U.S. 433 (2015).
- Winseck, D. (2022). The broken internet and platform regulation: Promises and perils. In T. Terry & F. R. Martin (Eds.), *Digital platform regulation: Global perspectives on internet governance* (pp. 229-257). London, UK: Palgrave Macmillan.
- Wu, T. (2003). Network neutrality, broadband discrimination. *Journal of Telecommunications and High Technology Law*, 2, 141-175.
- Wu, T. (2011). *The master switch: The rise and fall of information empires*. New York, NY: Vintage.
- Wu, T. (2012). Machine speech.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161, 1495-1534.
- Wu, T. (2018a). *The curse of bigness: Antitrust in the new gilded age*. New York, NY: Columbia Global Reports.
- Wu, T. (2018b). Is the First Amendment obsolete? *Michigan Law Review*, 117(3), 547-582.
- Wyatt, M. C. (2022, October 31). *How do you stop fake news? Guarantee the truth “pledged” would offer bounties for false inform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s://www.law.virginia.edu/news/202210/how-do>

you-stop-fake-news-guarantee-truth

- Wyden, R. (2018, March 21). Floor remarks: CDA 230 and SESTA. *Medium*. Retrieved from <https://medium.com/@RonWyden/floor-remarks-cda-230-and-sesta-32355d669a6e>
- Yoo, C. (2012). *The dynamic internet: How technology, users, and businesses are transforming the network*. Washington, DC: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 Zeran v. American Online, Inc.*, 129 F.3d 32 (4th Cir. 1997).

Balance Between Disinformation Regulation and Free Speech: The Legislative Boundaries of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Online Platform Intermediaries

Chien-Chih (Jesse) Lu*

Abstract

As digital technology continues to evolve with the Internet, imbalances in competition have resulted in a risk of monopolies in the online social platforms. These imbalances have led to political polarization and sedition, which have challenged the stability of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In this study, the constitutional right to freedom of speech, direct causal links, least restrictive means, and insufficient specificity were integrated into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demonstrate that a standard enacted to control the spread of disinformation would not be constitutional. On the basis of Section 230 of the US 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 this study proposes legislative and regulatory approaches for the digital environment. It further describes a legal standard for governing disinformation by upholding the Good Samaritan spirit.

Keywords: Section 230 of the US 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 platform liability, freedom of speech, disinformation, Good Samaritan

* Chien-Chih (Jesse) Lu, Assistant Professor,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